

◀ （上接 10 版）

点的文人,宋元易代之际,隐居不仕,遍评群书。刘辰翁评点《世说新语》,可谓是人人名书,后代一直颇为重视。明代凌濛初兄弟刊刻《世说新语》,都采入了刘辰翁的评点,但也频频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,把刘辰翁的批点与刘应登、王世懋等的相混淆,今人辑录和研究时沿其误,还没有人依据元刻本对刘辰翁批语做过完整的辑录。十年前,潘建国先生首先发现了《世说新语》的元刻本,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先后两次阅读了该书胶卷,这次“三汇本”整理刘辰翁的评点就是依据这个元本,而非从后世的汇辑本中转录,在文字上最为接近刘辰翁评点的原貌。

刘辰翁批点《世说新语》寄寓了难以言表的政治情怀,有时不容易看出来。《方正》第 37 则:“苏子高事平,王、庾诸公欲用孔延尉为丹阳。乱离之后,百姓雕弊,孔慨然曰:‘昔肃祖临崩,诸君亲升御床,并蒙眷识,共奉遗诏。孔坦疏贱,不在顾命之列。既有艰难,则以微臣为先,今犹俎上腐肉,任人脍截耳!’”于是拂衣而去,诸公亦止。”说的是苏峻之乱后,孔坦被出为丹阳廷尉,那里刚刚经历了动乱,百姓凋敝,孔坦不愿意去,说:“明帝驾崩前,诏王导、温峤、庾亮你们为顾命大臣,当时怎没想到我?现在把我派到这样一个混乱危险的地方去送死!”刘辰翁批曰:“小人语,岂识国家大体,见辱方正!”愤慨地斥责孔坦仅仅考虑一己的安危,置国家于不顾。刘辰翁曾在《湖山类稿序》里赞叹陪銮北上的一介布衣汪元量,可见他评论人物是有一杆秤的。又如《轻诋》第 9 则,刘惔死了,孙绰流泪泪咏:“人之云亡,邦国殄瘁。”褚裒看了大怒,说:刘惔跟你没什么交情,你为啥哭丧着脸,像是交情很深似的。刘辰翁就对褚裒很不以为然,反驳道:“邦国之叹,何必平生!”不论平生有无交情,当邦国遭遇深重变故时,都不免有“邦国之叹”,刘辰翁这八个字批语实在是自抒其怀。

虽然《隋书·经籍志》把《世说》列入子部“小说家”类,但是唐人主要还是把它当做史传杂说来读的,唐修《晋书》就大量采纳《世说》的文字,如《王献之传》《王徽之传》基本上就是连缀《世说》的相关文字而成的。刘辰翁则是真正把《世说新语》当“小说”看待。他批语有“小说多巧”,“小说取笑”,“传之有秽,小说不厌”,“亦似小说书袋子”,认识到小说新巧奇幻的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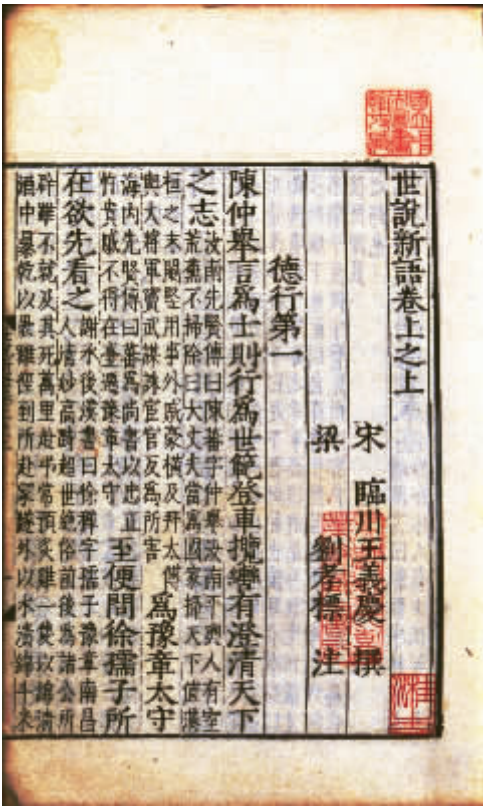
征。《容止》第 1 则:“魏武将见匈奴使,自以形陋,不足雄远国,使崔季圭代,帝自捉刀立床头。既毕,令间谍问曰:‘魏王何如?’匈奴使答曰:‘魏王雅望非常,然床头捉刀人,此乃英雄也。’魏武闻之,追杀此使。”如果说曹操使人代己是实事,那么最后一句“魏武闻之,追杀此使”肯定是虚笔,这是小说家的笔法,刘辰翁就看出来了:“谓追杀此使,乃小说常情。”说刘辰翁批点《世说新语》是最早的小说评点,是恰如其分的。

汇评,古已有之

评点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阅读方式。单独的“评”和“点”都出现得很早:孔子就评过《诗三百》。汉末祢衡《鹦鹉赋序》说他作赋,“笔不停缀,文不加点”。点就是点灭其字,修改的意思,不是现在的加标点。既有评又有点的阅读方式是从宋代才有的。评点和注疏相比,阅读者的主体性地位大为提高,汉人注经,是转述经旨,着力在把圣人的意思说明白,注者匍匐于经典的权威之下。唐人的义疏有个原则,“疏不破注”,屈伏在汉儒脚下,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充分的表达。到了宋人手里,踢倒汉唐,大胆疑经,注重读者的会心自得。洪咨夔《易斋诗稿跋》云:“诗无定鹄,会心是的。”会心,允许读者自由发挥,大大拓展了阐释的空间。正是在新的阐释学理论的启发之下,评点这种自由灵活的批评形式才得以出现。

评点的流行,与刻本的出现有紧密的关系。唐以前的抄本、写本,即使有评点,也是孤立的、私人的现象,不利于传播和流行。至宋元,刻本盛行后,名人评点得到出版家的青睐,评点借刊刻得到广泛的传播。如刘辰翁南宋德佑元年(1275)批点《韦苏州集》,元至元二十四年(1287)由康绍宗刊刻行世;他批评杜甫、李贺、王安石诗集,都是去世后刊刻的,很快就成为畅销书。

到了明代万历时期,浙江吴兴的闵齐济和凌濛初两大家族把“评点”和“套印”结合起来,风火互助,相得益彰,推出了大量的“评林”和套印本,是明代后期的文化盛事。《史记评林》《汉书评林》等“评林”系列,就是今天所说的“汇评”。吴兴闵、凌,可谓是“汇评”之祖。套印本一般为朱墨二色,经传用墨,批评以朱,非常醒目;多家批点,就用不同颜色标识,有三色、四色,甚至五色的,如凌云



《世说新语》为文人提供了各逞才辩的“话语场”,其中一些故事是在挑战人们的价值观,引起后人纷纷议论。图为明嘉靖乙未十四年(1535)吴郡袁氏嘉趣堂刊本。

五色套印本《刘子文心雕龙》。当时这些汇评行销全国,天下无不知有凌氏书。陈继儒《史记钞序》说:“吴兴朱评书籍出,无问贫富好丑,垂涎购之。”

吴兴套印本在明末毁于兵燹,清代就不大流行套印本了,虽然晚清的时候出现过一些套印本,如黎简批点李贺诗、黄培芳批点《唐贤三昧集》等,但总体上说套印已不盛行,这跟出版家的财力有关系,套印程序复杂,费工费钱;但更主要的是学风的变化,理学家认为对儒经加以评点,轻佻狂妄,非先儒训诂之法,实学家认为考据才是学问,评点信马由缰,算不得什么。所以评点虽然还未完全消失,但已是不绝如缕了。主要的用武之地是指导年轻人写八股文、试律诗,所以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,评点被胡适、鲁迅等人视为八股文话头,通通抛弃。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演绎式的文学批评,理论先行,往往讲得头头是道,其实离文本越来越远。

评点是不能脱离文本的批评方式,有些评点看似三言两语,实际上是一言中的;有些评点近乎文本细读,如清初吴淇的《六朝选诗定论》,对诗歌分析之细致透辟,今人也难以企及。可惜,评点这种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在现代学术范式里被排斥,受冷落,这是我们今天年轻人文本解读能力薄弱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

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“评点”这种中国式的文学批评,下过大工夫整理评点文献。起先是小说戏曲的汇评本,如张友鹤《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》、刘辉《会评会校金瓶梅》、李汉秋《儒林外史汇校汇评》,四大名著都有汇评本。诗

集的汇评本,李庆甲的《瀛奎律髓》、詹锓的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》堪称典范。我做《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》,就是学着詹锓先生的方法,尽量掌握《世说新语》的版本,尽可能地搜集相关文献资料,想为“世说学”打下文献基础。

众口纷纭谈《世说》

王恭说:“名士不必须奇才。但使常得无事,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便可称名士。”自唐宋以降,不要读《离骚》了,熟读《世说》便可称名士。《世说》是诗料,是谈资,能佐酒助兴,娱情解闷,可激励世俗,抑扬风雅。文人大约没有不读《世说新语》的。唐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、陆龟蒙《小名录》、佚名《珣玉集》,宋人曾慥《类说》、叶廷珪《海录碎事》,金元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》,明人周婴《卮林》、方弘静《千一录》,清人姚范《援鹑堂笔记》等都大量征引《世说》故事,或作引伸,或加以辨正。有十余人专门评点过《世说》,王世懋一生还多次加以品评。

《世说》行世后,影响广泛,出现了一些仿作,如宋人孔平仲《续世说》、明人李绍文《皇明世说新语》、清人王晔《今世说》、近人夏敬观《清世说新语》,以及《女世说》、《儿世说》、《僧世说》等。明后期盛行山人名士的风气,名士们把《世说新语》当经书宝贝读,于是出现了不少仿作品,郑仲夔有《清言》,何良俊有《语林》,王世贞把《世说》删削后与《语林》合为一起,称《世说新语补》,他人又补入

李贽批语,影响尤巨。

《世说新语》为文人提供了各逞才辩的“话语场”,其中一些故事是在挑战人们的价值观,引起后人纷纷议论。最典型的就是《德行》第 28 则“邓攸避难弃子全侄”的故事。西晋末永嘉之乱,邓攸挑着儿子与侄子俩小孩逃难,自然跑得不快,形势非常危急,他对妻子说:“我弟弟早死了,只剩下这个侄子传嗣血脉。今形势仓皇,不能两全,不如丢弃我们的儿子,带着侄子逃难吧,反正我们以后还可以再生嘛。”妻子同意了。读到这里,似乎还可以勉强认同邓攸的做法。但刘孝标注引《中兴书》曰:“(邓)攸弃儿于草中,儿啼呼追之,至莫复及。攸明日系儿于树而去,遂渡江。”丢弃小儿,小儿在后面追到傍晚追上邓攸,他竟然第二天把小儿缚在树上自个儿离去了。这不是伤天害理嘛!哪儿有这样做父亲的!后人坐不住了,王骥斥此最害名教;俞德邻骂他绝灭天理;郎瑛感叹晋人竟然如此好名;刘应登、李贽、严衍、张懋修说邓攸最终无子,是老天的报应,他就该绝嗣;王世懋视邓攸为一大忍人;王鸣盛骂道:“小人哉,攸也!斯人也,而可以人良吏乎!”近人赵西陆也说:“此矫情以博孝友之虚名耳。”大家都置疑邓攸这样的人怎能进入“德行”门呢!

这个事实实在是重人伦的国人所无法接受的,于是也有人巧辩,为邓攸解围。刘辰翁就说:“谓系儿树上者,喜谈全侄而甚之也。”“甚之”,就是夸张的笔法。朱国祯也说:“此史臣描写太过,伯道(邓攸字)决不狠戾至此。”意思说这是史家夸大其词,事实并非如此。但是方弘静就说:“称人之善而过其实,适以诬之。”周召说:“誉之太过,而反没其真耳。”挑战人伦界限的夸张描写,在中国文化里也是不被允许的。

举这一个例子,就可以看出后世文人对《世说》有多么浓厚的兴味。把这些材料汇辑起来,对于我们深入理解《世说》,是不无意义的吧。

日本《世说》研究举要

日本江户时期,随着《世说新语补》的传入,掀起了《世说》热。自 1749 年冈白驹《世说新语补觚》起,先后出现了桃井白鹿《世说新语补考》(1762)、大典禅师《世说钞撮》(1763)、恩田仲任辑《世说音释》和田中

（下转 12 版） ➡